

论《月月小说》对《新小说》办刊理念的承继与偏移

李晓丽

(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2)

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2期

内容提要: 本文以《月月小说》对《新小说》办刊理念的承继与偏移为对象, 分析在晚清特殊文化语境下小说杂志之间的继承延续性, 揭示出动荡的时局、创作主体定位差异、阅读期待视野对小说杂志办刊理念产生的动态影响, 由此呈现晚清小说特殊的言说方式及徘徊于传统与近现代之间的小说观念的嬗变过程。

关键词: 月月小说 新小说 办刊理念

1902年,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小说》杂志, 曾被视为“小道”难登高雅之堂的小说被提升到“文学”的高位, 一跃成为“文学之最上乘”。以《新小说》为首的诸多晚清小说杂志的兴起, 不仅开创了晚清时期小说繁荣的局面, 也促进了小说观念、思想主题形式及小说传播模式的现代性转化。

一、《新小说》杂志的创刊源起

1895年5月, 英国人傅兰雅在《万国公报》刊登征稿启示, 举办新小说大众竞赛, 以“求著时新小说”, 这次征文竞赛最终的结果并不如人意。不过傅兰雅推崇“时新小说”的核心意图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我们发现其后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第五·说部书》中对小说功效的论述及提出将“新编”说部作为幼学教材书的主张与傅兰雅的征文意图无疑是共通的, 甚至可以说梁启超、严复等人把小说作为开通民智、进行启蒙宣传的利器是受到傅兰雅征文启事的启发和感染。

1898年, 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寄予厚望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103天, 即宣告失败。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中, 回想之前种种努力, 终于认识到民族国家要强盛, 只有“新民”即运用启蒙的手段使民众的思想发生变化, 使其成为德力、智力、体力全面发展的国民。因此, 如何开启民智, “养成多数人之政治道德、政治能力及政治习惯”成了最迫切的问题,¹梁启超希望能够寻找新的话语体系实现其启蒙主义的政治理想。“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 其魁儒硕学, 仁人志士, 往往以其身之经历, 及胸中所怀, 政治议论, 一寄之于小说”², 一次偶然的机遇让他接触到了政治小说, 并认识到政治小说对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产生的巨大影响。尽管“政治小说”通常采用演说、辩论的方式来引述政治制度、措施、治国方略等, 甚至直接从报纸上摘录新闻入文, 情节比较

简单，人物也不复杂，缺乏文学性，艺术价值并不高。但由于西方政治小说在开启民智和改良社会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梁启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政治小说这种言说方式来宣传表达其启蒙主义理想，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感化教育作用。1902年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开始创刊，之后连续刊登了《十五小豪杰》、《新罗马传奇》、《殖民伟绩》等政治小说。同年，他在日本横滨创办专门以刊登小说为主的杂志《新小说》作为“小说界革命”的舆论宣传主阵地，强调其希望借助小说实现启蒙理想的愿望。

梁启超丰富的办刊经验使得《新小说》杂志更多地吸收了日本和西欧杂志的特点，从创刊伊始就在杂志形式、栏目设置、运行机制、宣传发行等方面较为成熟，具有较浓郁的现代气息，并为踵继其后的其他小说刊物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1903年李伯元率先响应“小说界革命”的号召，创办了国内第一份小说杂志《绣像小说》。之后短短几年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中外小说林》等十多种小说刊物先后诞生，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已达到了50多种，造成了清末民初以报刊为主要阵地的小说创作和翻译盛行一时的崭新局面。包天笑后来回忆：“当时的小说杂志都是模仿《新小说》的，确实是《新小说》登高一呼，群山响应。”³

二、《月月小说》对《新小说》的继承体现及渊源

《月月小说》继《新小说》停刊后，于1906年11月在上海创刊，共出24期。其中第21号正逢创刊两周年，所以增设周年纪念大增刊。1909年1月停刊。在晚清众多纷纷响应“小说界革命”而兴起的小说杂志中，《月月小说》受《新小说》杂志影响最深，无论从办刊宗旨、小说观念还是杂志外观形式、栏目设置等方面都无疑是《新小说》杂志最忠实的追随者。

（一）创刊宗旨及外观形态的承袭效仿

在梁启超看来，小说作为“新民”的宣传工具，具有不可思议的“势力”与“效力”。他开始大张旗鼓地倡导晚清知识精英们应该以改良社会、改良群治为己任，革除传统旧小说中所宣扬的“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⁴积极创作出能够启蒙国民政治思想，促进国家进步，具有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新思想的“新小说”。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中提到：“一、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二、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构，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著。”⁵1906年，陆绍明在《月月小说》第3号《发刊词》中振臂呼应，鲜明地阐释其创刊宗旨：“本社集语怪之家，文写花管，怀奇之客，语穿明珠，亦注意于改良社会、开通民智而矣。”⁶可见，《月月小说》创刊之初即

继承了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小说”理想，亦注重发挥小说的社会改良功能。

从杂志外观上看，《月月小说》杂志刊首设计与《新小说》极为相似，经常刊登一些中外知名文豪的照片，同时配有世界各地名胜古迹的图片，杂志的排版印刷以及页码设置与装帧已经开始具有现代杂志的气息。在杂志栏目设置上，《月月小说》基本承袭了《新小说》的模式，每一期除了刊登大量小说以外，还开设了包括论说、札记小说、词林、杂录、附录、挥麈谭、诗钟等丰富的栏目。其中“论说”与《新小说》中开辟的“小说丛话”一样专门发表晚清小说理论，主要探讨小说的思想、主题、功效、美学价值及西方翻译小说中的创作技巧等。《新小说》中“杂录”一栏刊登了《新笑林广记》、《新笑史》，“札记小说”中刊载了包括《反聊斋》、《知新室新译丛》、《啸天庐拾异》三种，这样的栏目形式与内容取材在《月月小说》中得以延续，《月月小说》中“杂录”包括《讥谈》《西笑林》及吴趼人的《俏皮话》，“札记小说”包括《新庵译萃》和《新广译萃》，两者只是命名稍有差异。

此外，《月月小说》还继承了《新小说》参照西学体系创建的中西杂糅的小说类型观。《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预告《新小说》第1号的目录如下：“图画、论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剖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世界名人逸事、新乐府、粤讴及广东戏本等。此后还增添了法律小说、外交小说和奇情小说。”⁷尽管分类芜杂，标准不一，甚至有些小说类别明显属于生搬硬套之嫌，但这种前所未有的小说类型观却受到其他小说杂志的热烈响应，纷纷借鉴模仿。其中以《月月小说》为最，而且小说分类较前者更为细化，竟然多达三十多种。所以邯郸道人在第12号《月月小说·跋》中不由赞叹道“若以材料丰富，完全无缺者，舍《月月小说》，更无其二”。⁸如此庞杂细致的小说分类，也体现了《月月小说》的编者们宽阔的文学视野，对小说的题材内容及形式充满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意识。

（二）积极响应梁启超新“写情小说”的理论主张

“写情小说”在晚清时期的兴起与梁启超的倡导以及吴趼人的热烈响应有莫大之关系。1898年梁启超在其创办的《清议报》第一册中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其中对古典小说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益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⁹然而梁启超等人并没有简单地以“诲淫”的道德裁决来扼杀“写情小说”的生命，而是赋予“写情小说”以新的涵义，将之阐释为“人类有公性情二：一曰英雄，二曰男女。情之为物，固天地间一要素矣。本报窃附《国风》之义，不废《关雎》之乱，但意必蕴藉，言必

雅驯。”¹⁰强调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¹¹因此，《新小说》中陆续刊登了(日)菊池幽芳氏之著，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的《电术奇谈》及平等阁主人的《新聊斋·唐生》两种写情小说，均希图借写情而达到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的目的。

不过梁启超对于新“写情小说”模式的倡导并没有迅速得到响应。“两性私生活描写的小说，在此时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¹²这不仅由于救亡图存的时代原因，且新小说家们似乎对写情小说的评价依然停留于“淫猥鄙野”、“有伤德育”的消极迷惘阶段。在多达七十二期的《绣像小说》自始至终寻不见“写情小说”的踪迹，《新新小说》尽管开辟了“写情小说”栏目，也只勉强刊登了明末清初小说家吴梅村的遗稿《秣陵春传奇》一篇而已，再无其他。而首次对梁启超倡导的“新写情小说”主张热烈响应的唯有《月月小说》，正是在吴趼人的大举倡导实践下，晚清的言情小说才产生了迥异于之前陷入“溢恶”末流的狭邪小说的变化，在主题模式、取材倾向、叙事特征等方面均产生了新的演变，成为晚清“新小说”创作实绩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阿英《晚清小说史》云：“晚清小说中，又有名为‘写情’者，亦始自吴趼人。此类小说之最初一种，即《恨海》。”¹³《月月小说》杂志围绕着“写情”将小说类别细分为“写情传奇”、“侠情小说”、“苦情小说”、“奇情小说”、“言情小说”等多种，作为总撰述的吴趼人更是独创出一套“写情理论”。《恨海》开篇就对“情”字作出了重新界定：

“要知俗人说的情，但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¹⁴

吴趼人努力超越和淡化小说中的“儿女私情”，将“言情”与动荡的社会政治背景相融合，着力扩大言情小说的表现范围，意图涵盖更丰富的社会内容。可以说，吴趼人的“写情小说”理论在晚清时期是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而且对民初以后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两种小说杂志继承之渊源

欲论及《月月小说》与《新小说》之间的继承渊源，不能不提及梁启超及《新小说》与吴趼人、周桂笙的关系。对于吴趼人、李伯元等晚清文人们来说，梁启超关于“新民”理论的倡导正契合了他们忧国忧民的焦虑。他们改变了之前创办小报编写“游戏文章”的无为状态，转而开始创作大量的“谴责小说”来揭露浮现于社会表面的种种弊端，热心关注时政，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与懦弱无能。从《新小说》第八号起，受到梁启超关注的吴趼人正式加

入了《新小说》的创作队伍，并迎来了其创作生涯中的多产期，《新小说》第八号连续发表了他创作及衍义的4篇作品。而周桂笙是晚清影响较大的文学翻译家，与吴趼人是知友，两人同时受聘于《新小说》杂志社。二人并驾齐驱，为《新小说》杂志重新注入新的活力。

《新小说》杂志于1906年1月停刊，同年11月《月月小说》创刊于上海。在《月月小说》的主办者汪惟父的极力邀请下，曾受聘于《新小说》杂志的吴趼人、周桂笙分别担任《月月小说》的总撰述和总译述。《月月小说》第2号刊载了一则“本社紧要广告”：

本社所聘总撰述南海吴趼人先生、总译述上海周桂笙先生皆现今小说界、翻译界中上上人物，文名籍甚，卓然巨子。曩者横滨《新小说》报中所列名著，大半皆出两君之手，阅者莫不欢迎。兹横滨《新小说》业已停刊，凡爱读佳小说者闻之，当亦为之怅怅然不乐也。继起而重振之，此其责舍本社同人其谁与归？爰商之二君，自三号以后，当逐渐增多自撰自译之稿，以飨阅者诸君之雅望，幸乞留意焉。月月小说社总经理庆祺谨告。¹⁵

吴周二入加盟《月月小说》后，毫无疑问他们在《新小说》期间的办刊经验定然为《月月小说》带来深刻的影响。两人积极参与了创办过程，并以丰富多产的小说撰译为扩大杂志社会影响及销售市场作出许多努力。《月月小说》第四号“评林”后刊登了一段署名月月小说社“社员谨志”的文字，

“本社创办之初，首承上海周桂笙先生之竭力相助，苦心擘画，无微不至。既而本报第一期出版以后，海上各日报无不异口同声，称赞有加，则皆总撰述吴趼人先生主持之功也”。¹⁶

可以说，正是由于吴趼人和周桂笙的存在，《月月小说》方与《新小说》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

三、《月月小说》对《新小说》办刊理念的修正与偏移

1906年11月，《月月小说》继《新小说》、《绣像小说》之后创刊于上海，杂志最初的编辑兼发行者为汪惟父，第1年第4号起，编辑者改吴趼人，印刷兼发行者汪惟父。办刊至1907年5月前后，突然停刊四个多月，直到1907年10月才出版了第9号，此时编辑者已改署为许伏民，印刷兼发行者为沈济宣，继乐群书局之后改由群学社图书发行所发行，并一直维持到1909年1月第24号终刊为止。《月月小说》转至群学社发行时期，其小说创作主体以及小说类型的选择取向都发生了一定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吴趼人、周桂笙并驾齐驱的地位有所下降，包天笑、陈冷血、天僂生等作家后来居上，似乎更受到欢迎与重视。杂志后期商品化、娱乐化倾向日渐明显，稿酬制度的建立使得职业化小说家开始注重迎合更广泛层面上的读者群阅读期待视野，力图体现杂志亦雅亦俗的文化品位。

（一）补充和修正梁启超的新小说理论

晚清后期更加腐败的社会现实，促使吴趼人、王钟麒、徐念慈等人开始重新审视新小说政治话语覆盖下的文学功利性功能，不再盲目追崇附和将小说极端视为政治改良工具的倡导。他们意识到不能让文学仅仅服务于某一种目的，应该回归文学本体且注重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强调小说的趣味和情感的审美艺术功效，试图补充和修正梁启超的新小说理论。

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序》中曾批评性地总结道：“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牛充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求其所以然之故曰随声附和故。”¹⁷无独有偶，次年王钟麒也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一文提到：“新小说之出现者，几于汗牛充栋，而效果仍莫可一睹，此不善作小说之过也。”¹⁸对于大量应“小说界革命”而兴起的“新小说”，王钟麒、吴趼人等人并没有盲目的乐观，而是较为冷静客观地评估“新小说”的改良功效及创作实绩，他们发现打着“新小说”的旗号实则鱼目混珠的劣质之作比比皆是，从而呼吁小说家们“宜厘定体裁，宜选择事实之于国事有关者，而译之著之”¹⁹，才可以真正发挥小说有益于群治之进化的效果。此外，吴趼人还总结出小说的特别作用亦包括“足以补助记忆也”、“易输入知识也”，欲“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²⁰吴趼人等人希望借助小说的趣味性、通俗性、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向更广泛的普通民众传输先进的文明知识，以此提高国民素质、转化社会不良风气、完善道德规范。

（二）小说创作题材重心的偏移

杂志的办刊理念始终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创作主体定位密切相关，当我们仔细梳理两种杂志的发展演变过程，不难发现，无论是《新小说》还是《月月小说》，均遭遇了中途更换编辑主体的现象。1902年创刊的《新小说》由新小说出版社发行，最初编辑兼发行者虽为赵毓林，实际上是由梁启超在幕后主持。从1903年1月第3号发刊之后经历了两次停刊变故，从第8号起，梁启超将《新小说》交给了吴趼人，他在《新小说》中的重要作用也让位给了吴趼人。此后，杂志的创作倾向随之发生变化。

作为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影响，倡导自由平等，反对专制政体，主张以维新革命改造文学，反对因袭和保守。作为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功利性的文学观主要是为了服务于他的政治文化思想的。而吴趼人、李伯元等人是以接受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教育为主，在政治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支持温和改良，倡议“排满”却反对激进革命。因此，从吴趼人加盟《新小说》后直至停刊再没有出现过类似《新中

国未来记》的政治小说，而其开创的以批判和讽喻为主的“社会小说”开始兴起。

《新小说》后期出现了大量诸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等社会小说，这意味着自从吴趼人接手《新小说》杂志后，其创作题材重心已从宏大的政治改革话题转向对社会种种“怪现状”问题的关注与批判。

从《新小说》到《月月小说》，此间作为编辑主体的吴趼人，其创作思想也随着时局的激烈动荡而发生明显改变，从而影响到小说创作题材重心的进一步偏移。1906年9月，腐朽没落的晚清政府迫于时局的重重压力，故作姿态想要模仿西方国家实行立宪制，意图维护其飘摇欲坠的封建皇权统治，以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派为君主立宪到处奔走宣扬。创刊于1906年11月的《月月小说》不可能对立宪事件无动于衷，对于中国国情是否适合立宪制，国民是否已经具备立宪资格，晚清政府此番“预备立宪”的真正内幕究竟如何等问题，《月月小说》杂志表示出了积极地关注并展开激烈的讨论。吴趼人发表了一系列以立宪运动为主题的小说，揭露和批判了晚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此外，关注立宪问题的小说有燕尸狗屠的《中国进化小史》、萧然郁生的《新镜花缘》、大陆的《新封神传》、报癖的《新舞台鸿雪记》、春颿的《未来世界》等。小说家们或展望或批判，均对立宪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政治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思考。这类以“时事”为题材的小说更强地显示出晚清小说叙事的“当前性”特征。

如果说吴趼人在《新小说》中的创作更多集中于批判种种社会“怪现状”，那么《月月小说》时期的吴趼人更像一个保持清醒的旁观者，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动荡变化，开始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思考。面对与清廷决裂的革命党人采取的种种武装起义，他由于身份的局限而与革命派始终保持着隔阂。而此时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假革命、假维新，假立宪的现象又令他深恶痛疾，转而颓废失望。吴趼人一直试图寻找到合理的适合晚清国情的改革途径，最终他将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归结于社会道德沦丧的结果，所以急切希望能够借助恢复传统伦理道德来挽救晚清没落的现状。

关于道德教育的规范，梁启超早在言及《新小说》的宗旨时即有“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²¹，但梁启超提倡的是“泰西新道德”，“吾畴昔以为中国之旧道德，恐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也，而渴望发明一新道德以补助之”，“吾固知言德育者，终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补助”，“而‘一切破坏’之论兴，势必将并取旧道德而亦摧弃之”。²²而吴趼人所宣扬的“文明专制”之道德却与之相反，恰恰是要求保持和恢复传统旧道德。他在《上海游骖录》书后跋文中说：“以仆之眼，观于今日之社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意见所及，因以小说体一畅言之。”²³在“传统道德救国”理想的影响下，吴趼人开始奢望通过

具有完美理想人格形象的塑造，宣传其理想中的封建传统道德价值标准，以此促进晚清社会秩序的重新构建，从而恢复生机。因此《月月小说》杂志相应刊登了《劫余灰》、《含冤花》、《学界镜》、《红宝石指环》、《义盗记》、《桂旒节孝记》等小说，其中主人公多是具有完美人格的道德典范。当然，吴趼人的“道德救国”论无疑属于唯心主义的的良好愿望，时代的局限使得吴趼人等晚清文人志士们无法探索出正确合理的改革途径，但他们始终“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抱负却是令人可敬可佩的。

（三）杂志的商业性、娱乐性特征日趋明显

晚清小说主要以报刊杂志为载体，其创作、发行、营销等环节皆需纳入商业运作轨道，所以晚清职业小说家们不但肩负启蒙救世使命，还要兼顾日益扩大的市民大众的阅读接受水平。因此，《月月小说》与《新小说》相比，更注重杂志的商业化经营策略，一方面注重发挥小说“新民”、“启智”的社会功能，同时为了扩大市场影响力，保证杂志运营所需的各种开支，还要迎合普通市民读者的口味，主动选择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发挥传统小说娱目与醒心的功能，以此扩大小说杂志的销售范围。

《月月小说》的商业性特征首先体现在通过刊登种种宣传广告、商业广告以扩大小说杂志的社会知名度和销量。例如“评林”中主要刊登国内外报刊对于《月月小说》杂志的内容、形式以及印刷等方面的评价，大多褒奖溢美之词；而出版书局必然希冀通过登载商业广告来维持杂志出版所需的各种费用。据统计，《月月小说》中共刊登商业广告70余则，涉及面十分广泛，穿插点缀在杂志中，甚至出现在杂志上刊登数页长篇广告的情况，而这样的商业广告在《新小说》中并不多见。

其次，杂志的商业性特征必然促使编者对小说娱乐审美功能的重视。《新小说》以刊登政治小说、历史小说、哲理科学小说为主，企图通过“新小说”的政治功用来解决现实社会的种种危机与焦虑，导致小说文本中充斥着大量的政治理论与道德说教，小说的娱乐功能与艺术审美功能自然被忽视。而《月月小说》中刊登较多的是社会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诙谐小说、滑稽小说、心理小说、游戏小说等，相比较而言后者小说类型的选择更符合普通民众的欣赏趣味。“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输入之而不自觉也”。²⁴这种趣味化的倾向在许伏民担任《月月小说》主编之后表现地更明显。《月月小说》中途停刊四个多月，恢复刊出的第9号中即刊登了一篇《本社广告》：

“《月月小说报》因停顿已久，致劳阅者注盼。本社接受以来，承海内外诸君纷纷投函索取，本社欲膺阅者之目，商诸同人，先将前期未竣之稿及新出撰译各

部编辑第九期，赶于九月一日续出，刻复聘订著名大撰译家冷血、天笑二君，为当代所欢迎，自第十期起，大加改良，庶不负诸君殷殷之期望，并增“挥麈谭”、“词林”二部，以为文人交通机关。骚坛彦硕，绮阁名媛，如有逸事诗词，尚乞源源惠寄，敬当刊登，以光简册，毋任欣祝。”²⁵

结合《月月小说》第15号和第20号中的征文广告，征文范围从“科学、理想、哲理、教育、政治诸小说”到“历史、家庭、教育、军事、写情、滑稽”，不难发现小说题材旨趣明显发生变化，出现了向消闲娱乐题材逐渐转移的趋势。再如第13号中一改之前以历史小说主导开篇的惯例模式，而改由包天笑翻译的哲理小说《铁窗红泪记》位居篇首，令人耳目一新。而第15号首次以滑稽小说开篇，继之为家庭小说、虚无党小说、苦情小说、冒险小说、立宪小说、侠情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历史传奇等等。此外陆续增载的寓言小说、诙谐小说、游戏小说、杂录以及吴趼人创作的俏皮话等具有较强娱乐性的小说类型更符合普通民众的欣赏趣味。

不过杂志在面向市民阶层读者群的同时，并没有忽略以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除刊载小说以外，也另辟一片天地以满足这部分读者的创作鉴赏需求。在《月月小说报改良之特色》中曾提到：“本报更增‘挥麈谭’、‘词林’二门，以为文人交通机关，藉兹互换知识，以收他山之助。”²⁶杂志每一期除了刊登大量小说以外，还附有词林、灯谜、诗钟等丰富的栏目以满足传统士大夫们吟诗唱和，抒发情怀的需求。而且杂志社还不定期地举办诗词征题和联诗活动，并对应征者的作品进行评选评奖，以调动文人读者参与的积极性，其中蕴藏的商业化经营策略亦体现了编者与发行者的良苦用心。《月月小说》杂志兼顾了普通市民与传统文人两种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不断调整杂志的办刊理念和市场定位，力图向亦雅亦俗的文化品位发展。

阿英在《清末小说杂志略》中对《月月小说》杂志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它开启了后来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和黑幕小说，从而断言其“成就殊不大”。不过，这样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的。尽管《月月小说》注重小说杂志的趣味性、商业性、娱乐性，但并未忽略小说创作的思想性，自始至终都能够遵循着“振国民之精神，开国民之智识”的创刊宗旨。诚然，《月月小说》中后期的杂志理念与办刊风格已与前期积极响应的“新小说”严肃的政治启蒙宗旨有所疏离，然而其更注重小说的艺术性、娱乐性、趣味性，主动迎合小说读者的阅读旨趣，使小说的功能由单纯的政治启蒙性逐渐向启蒙性、思想性与娱乐性并重的多元化趋势转变，其向小说本体功能回归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作为晚清后期小说思潮的代表，《月月小说》是一份富有探索性的刊物，它引导着晚清小说思潮和文体趋向多元化的发展，以及蜕变。²⁷可以说，无论是丰富繁杂的小说文类观、初具现代特色的商业

文化产业特征还是过渡时期小说理论的相关探讨，以及对诸如“短篇小说”等现代小说文体的倡导与尝试，《月月小说》都堪称晚清向民初过渡阶段小说期刊的典范，成为研究晚清时期小说创作成就时不能忽视的一道风景线。

注释：

- 1 梁启超：《儒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
- 2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 3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57页。
- 4 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 5 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 6 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 7 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63页。
- 8 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页。
- 9 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 10 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 11 《新小说社征文启》，载《新民丛报》第十九号，1902年。
- 12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 13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173页。
- 14 吴趼人：《恨海》，吴趼人全集(第2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 15 载《月月小说》第1年第2号，1906年。
- 16 评林，《月月小说》第1年第4号，1906年。
- 17 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 18 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 19 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 20 吴趼人：《月月小说·序》，载《月月小说》第1年第1号，1906年。
- 21 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 22 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 23 吴趼人：《上海游骖录》，载《月月小说》第1年第8号，1906年。
- 24 吴趼人：《两晋演义·序》，载《月月小说》第1年第1号，1906年。
- 25 载《月月小说》第1年第9号，1907年。
- 26 《月月小说报改良之特色》，载《月月小说》第1年第9号，1907年。
- 27 杨义等：《中国新文学图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